

寫本視角的版本思維觀察

——以敦煌寫本為中心*

竇懷永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六萬多件寫本文獻，為世人生動展示了魏晉六朝至五代宋初間寫本在紙張、字體、裝潢、內容、形式等方面的豐富性，促使人們開始關注這種曾被雕版印刷奪去光芒的典籍形態。隨後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契約文書等陸續公諸於世，再加上清朝末年就在甘肅、新疆、陝西一帶發現的晉代《戰國策》《三國志》古抄本等，寫本文獻在總體數量上的快速增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寫本文獻在抄寫時間上的天然價值，更促使諸多學人各就其不同方面進行整理與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從2007年初，我在張涌泉師的指導下，開始着手校理敦煌文獻中留存的符合古代小說特點的寫本。在進行到《金光明經》的感應記部分時，從當時業已公佈的敦煌藏品中，梳理出S.364、P.2099等31件寫本¹。在對各寫本逐一錄文後，我發現，這些寫本至少在首尾題寫的卷名、抄接的佛經譯本、具體文句的用字等方面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不僅存在某幾件寫本大體相似、却與其他寫本完全不同的常規情況，也存在類似於表面上取兩種寫本的文字相互拼合而形成另一種寫本文字的特殊現象。因此，倘若持刻本文獻積累的常規“善本”標準或思路，選取這些寫本中的某一件為底本、其他30件為校本，整理出一個定本，不僅需要在校記中以大量的篇幅描述各寫本之間的具體不同以及某幾件寫本之間的基本雷同，未免過於繁瑣，即使是整理出來的“定本”文字，似乎也難以直觀反映出敦煌寫本《金光明經》感應記在語句表達方面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這種困惑與困難，也在我拜讀學界前輩對該感應記的整理成果中得到進一步驗證。周紹良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撰寫《敦煌文學》之“小說”部分時，以《金光明

*本論文成果受浙江大學“雙一流”重點建設項目“中華優秀文化傳承與創新計劃”支持。

¹有關《金光明經》感應記所涉各寫卷的敘錄及最終校理情況，請參見《敦煌小說合集》，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95-329頁。

經》感應記的內容為例，順手彙錄了開頭小段，并說是根據“S.4487、S.6035等”錄成²。90年代期間，鄭阿財先生撰《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研究》³，對其時發現的25件感應記寫本作簡要敘錄，重點對小說的內容特色與意義作考察。在其中的“錄文”部分，鄭先生似乎并未明確指出是以哪件寫本作為底本進行整理，僅言首尾完整的計有S.3257等七件，“文字無甚差異”，遂“將校定後之全文彙錄如下，以資參考”，云云。從具體文字的比對來看，鄭先生應當是至少將北1426號和伯2099兩件寫本的文字整合後逕行寫定。2000年，楊寶玉先生發表《〈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校考》⁴，對其時發現的26件寫本進行敘錄，討論研究價值，進而“依據保存完整的S.3257、北1361、北1362、北1367、北1424、北1426、P.2099、L.735（即Φ.260）等卷校錄，并斟酌參考其餘各卷”，仔細校注，“諸卷文句差異較大者，於校注中作適當說明，而文義相同，僅用詞用字小有區別者，則擇善而從，不復一一標注”。

倘若以表格的方式，選取感應記中的幾處描述文字，將鄭、楊兩位先生整理的定本略作橫向對比，則相互之間在同一個文句上的具體不同，可能會表現的更加直觀一些：

鄭先生整理本	楊先生整理本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身供養，願怨家解釋。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怨家解怨釋結。
王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	王即又帖五道大神尋檢化形文案。
既無報對，偏辭不可懸信，判放居道再歸生路。	既無執對，偏詞不可懸信，判放居道再歸生路。
此經天下少本，詢訪不獲，躬歷諸方，遂於衛州禪寂寺檢得，抄寫隨身供養。	此經天下少本，詢訪不獲，躬歷諸方，遂於衛州禪寂寺檢得諸經目錄，抄寫此經，隨身供養，受持讀誦。
狀如夢惛惛，常有雞、猪、鵝、鴨，一日三回，競來咬嚙，痛不可當。	狀如眠夢惛惛，常有雞、猪、鵝、鴨，一日三回，競來咬嚙食啖，痛不可當。
從來應其到時遂乃不見。	應其時到，乃不見。
或銜賣與人，取其財價，以為豐足，皆須一本一造，分明懺唱，令此功德，資及怨家，早生人道。諸訟自休，不復執逮。	或銜賣與人，取其財價以為豐足，須生悔過，速寫《金光明經》。懺悔功德，資益怨家，早生人道，拷訟自休，不復執逮。
善男女等，明當誠之。	善男子善女人等，明當誠之！

²詳見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之“小說”篇，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1-282頁。

³鄭先生文章先是以《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初探》為題，收入《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灣文津出版社，1996年）；後又以《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研究（初稿）》為題，收入《敦煌文藪》（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再經修改後，去掉“初稿”二字，收入鄭先生大著《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詳參第81-111頁，下文之引用亦逕據此書。

⁴楊先生大作收入《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28-338頁。

誠然，各個寫本和具體文本之間存在的些許差異，基本不會影響對該篇感應記的文學意義、佛學價值、史學意義等多角度的探討，這可能也是前輩們直接寫定文本的原因之一。不過，各版本之間相互關係的辯證分析與各文本之間差異文字的妥當處理，以及居於版本和文本背後的內在促成原因的探索，却又是古典文獻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種情境之下，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寫本形態文獻的版本梳理，有著不同於刻本的特點，那麼，在整理敦煌寫本時，是否一定要沿襲整理刻本文獻的普遍做法，從幾個甚至幾十個敦煌寫本中選定某一件寫本作為唯一的底本，進而校理成唯一的一篇定本？

基於這樣的疑問，我進而又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疑慮：

- (1) 敦煌寫本發現的晚清時期，雕版印刷技術已經高度成熟，刻本文獻已經成為佔據絕對優勢的載體形態，其學術研究是在刻本及其版本系統為主導思維的學術氛圍下逐漸起步和發展的，突出表現為秉承漢學傳統、兼容宋學而又出新，重視考據，推崇文字訓詁與版本考證。敦煌學發軔之初，以羅振玉、劉師培為代表的晚清學者飽受傳統學術之寢染，在獲睹中古時期的寫本文獻資料後，自然而然地會將其研究刻本文獻中所形成的分析方法、思維習慣、整理經驗等應用於敦煌寫本的研究與整理上，則難免存在著相對忽略刻本與寫本形態各具自身特點的可能性。我想，這對後來學者應當會有不同程度的示範性影響。
- (2) 如果直接將刻本時代形成的文獻整理思維施之於寫本，所帶來的最直接的負面影響可能是：比較容易將同一種文獻內容的多個寫本在版本上視為均源自同一個底本，進而在校錄時以某一個寫本為底本、其他多個寫本為校本，最終寫定生成一個相對更善的文本。那麼，這樣的思維方式與校理方法，則容易造成至少兩個問題：其一，從多個寫本之間選取某一個寫本作為底本時，文本之間的近似性容易成為干擾因素。其二，以不同寫本作為底本而整理校勘後的定本文字之間，文字差異比率會相對較高。

有鑒於此，當時我個人“自告奮勇”地將 31 件寫本的《金光明經》感應記文字作了縱向差異性和橫向一致性的對比，進而劃分出了六個傳抄系統，希望既能彰顯出各個不同的傳抄系統之間在重點語句方面的明顯區別性，又體現出各個傳抄系統內部在特徵字詞方面的相對一致性⁵。

⁵2013 年前後，日本杏雨書屋開始陸續出版東洋學泰斗羽田亨博士收藏的敦煌寫本。《敦煌秘笈》第 3 冊中有一件編號作羽 192 號的《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寫本，經過梳理，歸入我個人劃分的系統乙中，則《金光明經》感應記所涉及的敦煌寫本數量達到 32 件。詳可參考拙文《敦煌寫本〈金光明經〉感應記傳抄系統研究》，收入《在浙之濱—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16 年，第 335-348 頁。

系統甲以北 1426 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北 1367、S.462、S.6514、S.4487、 Δx 5755，共計六個寫卷；

系統乙以 P.2099 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 S.3257、北 1424、北 1362、北 1363、北 1365、S.364、北 1425、 Δx 4363+北 1360、北 1369、S.9515、S.6035、 Δx 6587、 Δx 2325、石谷風藏品、 Δx 5692，共計十七個寫卷；

系統丙以北 1361 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 S.4984、北 1364，共計三個寫卷；

系統丁以 Φ 260 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 P.2203、S.2981，共計三個寫卷；

系統戊僅一件，編號爲 S.4155；

系統己僅一件，編號爲 S.1963。

這種嘗試將寫本分出傳抄系統來整理的方式，還應用在敦煌寫本《黃仕強傳》上。根據編撰《敦煌小說合集》時的統計，在當時業已公佈的敦煌文獻中共發現了《黃仕強傳》寫本 12 件，綴合後得到 P.2136、 Δx .1672+1680、浙敦 26 等 10 件，經過細緻比勘典型文句、用字習慣和區分表述口吻、行文方式等，並適當兼顧寫本各自的殘存情況，進而劃分出了甲、乙、丙、丁四個文本傳抄系統⁶。2016 年 9 月，方廣錫教授編著的《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出版。在這批公佈的 36 件敦煌寫本中，有一件編號作伍倫 27 號 1 的《黃仕強傳》寫本可以與 P.2136 歸爲同一個傳抄系統（系統丁），並且在文本完整程度上明顯要優於後者⁷。這樣一來，四個文本傳抄系統又得到了一些豐富：

系統甲，涉及卷號有浙敦 26 號、大谷大學藏品乙 71 號、P.2186、 Δx .4792 + 北 8290 和 P.2297。

系統乙，涉及卷號有上圖 84 號、中村不折藏本 68 號和 Δx .1672+1680。

系統丙，涉及卷號有北 8291。

系統丁，涉及卷號有伍倫 27 號 1 和 P.2136。

當然，必須要承認的是，這樣通過劃分傳抄系統來分別校理的方法，一方面是基於同一文獻內容的不同傳抄寫本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文本差異性的事實，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尊重文本差異性的前提下，從目前數量可見的寫本間，比對出內在的一致性特點，努力梳理（至少可以接近）文本傳抄的枝幹規律。很顯然，同一種

⁶有關《黃仕強傳》所涉各寫卷的敘錄及校理情況，請參見《敦煌小說合集》，第 249-263 頁。

⁷《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一書公佈了日本原大藏省書記官濱田德海蒐集珍藏的敦煌寫本 36 件，其中編號作伍倫 27 號 1 的正是《黃仕強傳》，則該內容的寫本數量增加到 13 件。經過文字比對後，可以確定與殘損最爲嚴重的 P.2136 屬於同一個傳抄系統，這也彌補了《敦煌小說合集》中《黃仕強傳》（二）現存整理文本不完整的遺憾。詳可參拙文《敦煌小說〈黃仕強傳〉新見寫本研究》，見於《敦煌學輯刊》2018 年第 1 期。

文獻內容存在多個寫本，且各寫本之間又存在各具特點的差異，在根本上是源於該文獻內容的原始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新的謄抄本後又“變身”為新的底本，繼續流傳，角色不斷循環、同時又不斷分化所致。這個分化的誘導因素，既包括了文獻的內容性質、抄寫載體、傳播方式、流傳區域等客觀因素，也包括了文獻誦讀者、文獻抄寫者、文獻修改者、文獻保存者等主觀因素，是各種主客觀誘因在共時層面與歷時層面交叉發揮影響的結果。每一個以人工手抄為基本特點的寫本，既具有作為文獻載體在文獻傳承中所表現出的普遍性，更具有寫本這種載體形態本身固有的獨特性。

平心而論，這些有關寫本的客觀問題與影響因素，在刻本文獻佔據數量優勢、版本系統作為主導思維的學術背景下，很難有充分的機遇表現出來，以至於非常容易被忽略。隨著百餘年來敦煌寫本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契約文書等其他寫本形態的文獻在數量上的不斷龐大，以人工手抄為基本要素的寫本文獻日益彰顯出其有別於刻本的自身特點。因而，我個人認為，或許有必要居於寫本的視角，重新觀察雕版印刷的產生與發展所帶來的版本主導思維的形成過程，理性分析刻本在替代寫本進程中對版本遞變的正負面影響，或可有利於重新估量寫本文獻校理與刻本文獻校理在版本系統上的不同處理方式。

二、版本與版本思維的形成

版本，初作“板本”，大約出現於五代宋初，其本義是針對以雕版方式印刷的書籍而言。不過，這個詞語的產生，本身就已經說明了至少兩個問題：一是以施之木板、雕刻上墨、折葉裝訂為基本特徵的雕版印刷，在技術上漸趨成熟，並開始成為主流的文獻傳播方式；二是以寫之紙張、手工謄抄、卷軸裝幀等為一般特點的寫本文獻，在生產速度與數量上已經明顯不具優勢，逐漸進入淘汰區間。

新技術的相對高效及其所激發的新熱情，促使大量寫本形態的文獻至遲從北宋開始就被爭先刊印成刻本形態，刊印文獻數量的增加又反過來促進了刊刻經驗的成熟，而刊刻經驗所帶來的技術水平提升又進一步刺激了刊刻熱情的提高。良性循環所生發出來的巨大作用力，有力地推動了雕版印刷的發展。無論是據社會階層而分作官刻、家刻、坊刻，還是以地域特點而分作浙本、蜀本、閩本，在北宋及其以後的宏大經濟背景下，雕版印刷對於文獻流傳所帶來的正面促進甚至一度完全掩蓋了其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這種雙重影響，也可以從生活於兩宋之交葉夢得的感慨基調中看得出來⁸：

⁸就目前的史料來看，葉夢得（1077-1148）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較早一批研究雕版印刷起源相關問題的人，他根據前代文獻，提出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唐代，這個觀點對後代影響較深。下方引文詳見《石林燕語》卷八，中華書局，1984年，第116頁。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鑿《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在我個人看來，倘若將葉夢得的上述親歷與感受放置於古代文獻繼承與傳播的大背景下，或許可以得出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共識：

- (1) 在“未有模印之法”的寫本時代，文獻內容的傳承與傳播是靠手工謄抄完成的，“人不多有”，因此，參與人員的文化水平、主觀動機等因素對於文獻的文本面貌、流傳範圍等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間接促成了具備各自特點的寫本傳抄系統的形成。
- (2) “傳錄之艱”的客觀事實與“藏書為貴”的主觀心理，不僅帶動了“誦讀精詳”這一基本的文獻傳承功能的更好發揮，也提高了寫本時代“精於讎對”這一類善本的產生概率和存世概率，甚至也為雕版印刷時代校勘學的成熟完善做了前期實踐與經驗上的積累。
- (3) 雕版印刷的高效率製作，使得至遲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有條件將寫本時代傳承下來的大量文獻陸續刊刻發行，“刊鑿益多”的有利局面相對改變了寫本時代文獻“人不多有”境況，以致“易於得書”，這不僅提高了文獻的傳播數量，也擴大了文獻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當然，雕版刊刻的方便性與傳播的高效性，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雕刻版本的多樣化，甚至是分化。
- (4) 相對於北宋雕版印刷文獻數量的日益增加，“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文獻底本的前期遴選工作則似有日益滯後之感。在《宋史》中，時常能夠見到當時的學人“手自校讎”的記載，如記畢士安“年耆日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⁹，記劉摯“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鈔錄，孜孜無倦”¹⁰。不過，“藏本日亡”的現實，顯然也減少了刊刻所據寫本形態底本的存世數量和傳世概率，這又反過來加劇了版本遴選工作的進一步惡化。

應當看到，雕版印刷漸趨代替紙本抄寫的事實，固然從對立面反映了寫本時代的沒落，暗示出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寫紙本文獻勢必大量消亡，更為重要的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僅以古籍中刻本形態的版本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版本學的興起與

⁹詳見《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9521頁。

¹⁰詳見《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第10858頁。

發展。例如清人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曾承接“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之論，對版本名稱加以討論¹¹：

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而近人言藏書者，分目錄、板本爲兩種學派。大約官家之書，自《崇文總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爲目錄之學。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雍乾嘉以來各藏書家，斷斷於宋元本舊鈔，是爲板本之學。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爲校勘之學。本朝文治超軼宋元，皆此三者爲之根柢，固不得謂爲無益之事也。

這段文字經常在討論狹義版本學的概念時被引用。“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業已刊刻實物的明顯增加與存而未刻寫本的隱性減少，倒逼“板本”中的“本”不斷弱化，而“板”則不斷強化。是故“近人言藏書者”，“板本”已足可與“目錄”抗衡而視作“兩種學派”。這樣也就容易理解，在狹義版本學的範疇里，自然是將時間定在宋元明清時期，對象則限於刻本。

誠然，版本學的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個人更願意認爲，葉德輝的論述一方面概括出了雕版印刷的出現對於傳統文獻學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明顯地促進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伴隨著雕版印刷的成熟和相關學科的發展，“版本優先”的思維借助於“板”的現實物質形態不斷固化，從而助長了心理層面的適應性與習慣性，即在心理與思維上首先以“版本”區分文獻，再運用考證手段論述這種區分的合理與否，進而再考慮版本的研究與使用問題。這樣一種自覺的思維過程以及隨之產生的自覺實踐行爲，我個人姑且稱之爲“版本思維”。

在我看來，“版本思維”是在刻本時代對於文獻版本重要性的突出強調，是在主觀理想上爲了追求文獻文本的歷史原貌和文獻內容的盡善盡美，在客觀行爲上形成的對文獻版本的重視，從而逐漸形成和固化的優先強調文獻版本、且以版本學方法研究和使用的思維。因此，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版本思維”大約可以表現爲：一方面，是以目錄學爲主要工具，藉助著錄、題跋等各種渠道，對文獻的版本生成、版本流傳、版本遞變等情況進行調查與考證，對文獻的早期版本、珍貴版本等進行探訪、購求與保護；另一方面，是運用校勘、訓詁、輯佚等多種“技術手段”，對文獻的當前可見版本進行文本比對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力求“生成”新的“更優”版本。容易看出，就這兩個方面而言，前者是爲後者的更好開展而服務的，後者是對前者的進一步發揮。從古文獻學史來看，這兩方面內容的交織作用對兩宋以後圖書的刊刻、流通、收藏等產生了意義非凡的影響：

¹¹詳見《書林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篇，中華書局，1957年，第25頁。

(一) 私家藏書在北宋以後成爲新潮流，文獻版本的影響因素和影響效應漸趨巔峰，而藏書經驗的積累也提升了版本意識。

藏書制度與藏書文化濫觴於商周、成型於兩漢，在寫本時代自然以官府藏書爲主體，集中庋藏和深藏秘閣成爲兩個重要的特點，但也相應存在著容易遭受毀滅性災難和藏書功能被削弱發揮的缺陷¹²。雕版印刷帶來的圖書數量增加和獲取容易程度提高，使私家藏書獲得了充足的成長動力，進而藉助科舉制度的深入實施、藏書目錄的自覺編制等諸多有利因素，與官府藏書相互補充文獻種類、相互借鑑經營技術，從而逐漸形成官、私藏書並駕齊驅、各領風騷的良好格局，也一度在明清時期以江南地區爲中心而漸臻黃金時代。

略窺諸多藏書史料即可發現，無論是在圖書的謄抄、校理、編纂、刊刻，還是在圖書的存放、搜求、管理、保護甚至捐獻等方面，“版本”被宋元以後的私家藏書推崇到了極爲重要的原則高度。例如南宋進士尤袤著有《遂初堂書目》，楊萬里在序文中記尤氏“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鈔書”，且記尤氏曾自稱“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云云¹³。又如明代藏書家趙琦美校理五卷本《洛陽伽藍記》，前後用時八年之久，計以五種版本校讎，訂訛補漏近九百處。清人黃丕烈收藏宋代刻本逾百部，自號“佞宋主人”，書齋取名“百宋一廬”，以至顧廣圻特撰《百宋一廬賦》以記之¹⁴。再如清代藏書家孫從添在《藏書記要·鑑別》中開篇就說，“夫藏書而不知鑑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¹⁵，寥寥數語，其對於版本鑑定的重視心態，躍然於紙上。《書林清話》卷六有“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篇，是知宋元刻本幾乎以葉計價，卷十有“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篇，更知其時嗜宋元版本而近乎偏執。這其中固然有文人雅士偏愛古物的風潮，但也反映出這些藏書家、文獻學家對於版本的重視。

¹²例如南朝梁武帝蕭衍在位近五十年，廣搜天下圖籍，謄抄繕寫，竭力充盈官府藏書，甚至要求王公大臣之書聽從皇室調配，而藏書處所在秘閣外又增置了文德殿、華林園和東宮。548年，侯景之亂，洗劫建康，“東宮圖籍數百厨，焚之皆盡”（《太平御覽》卷六一九引《三國典略》）。梁元帝蕭繹以皇族之優勢，積得圖書八萬卷，登位後又收得各類圖籍七萬卷，在位兩年間，江陵官方藏書至少在十幾萬卷。554年，西魏攻陷江陵，“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資治通鑑》卷一六五），王夫之故有“書何負於元帝”之歎。

¹³詳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七《經籍考》，中華書局1986年據萬有文庫十通本影印。

¹⁴《百宋一廬賦》，題署“元和顧廣圻撰，吳縣黃丕烈注”，嘉慶十年（1805）黃氏士禮居刊本。

¹⁵詳見《藏書記要》第二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34頁。

(二) 以考據學爲代表的治學方法，在版本時代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同時又促進了版本學的發展。

考據之學自然以清代、尤其是乾嘉年間最爲興盛。以顧炎武、戴震、孫詒讓爲代表的各派別考據學者，以經學文獻爲主，以漢儒注解爲宗，治學嚴謹，博通經史，重證據，考真僞，正訛誤，辨音讀，釋字義，校異同，運用校勘、辨僞、輯佚、注疏和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四部文獻、尤其是儒家典籍進行了細緻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使衆多文獻在流傳中所產生的各類錯誤、疏漏和篡改得以基本消除，使許多晦澀深奧、不堪卒讀的文獻基本可供閱讀研究，使許多真僞混雜、久已散佚的文獻的本來面目得以基本恢復。

衆所周知，在學術史上，曾受限於所謂漢學、宋學對立的觀念影響，一般將清代考據學的發展直接歸功至漢代經古文學的繁榮，而基本無視兩宋時期考據學在義理之學上的實踐成績和作用。實際上，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朱陸”篇中就已旗幟鮮明地指出，從朱熹、魏了翁到宋濂、王禕再到顧炎武、閻若璩，“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¹⁶。宋代經學領域的考據之學與元、明、清考據學，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張舜徽先生在《廣校讎略》中逕以《兩宋諸儒實爲清代樸學之先驅》爲題，認爲“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特承其緒而恢宏之耳”，例如“史部考訂之學，不外辨正異同，勘改譌失，則吳縝《新唐書糾謬》《五代史記纂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亦已導夫先路”¹⁷。在我看來，這樣符合事物發展一般規律的論斷，可能才更加符合考據學對於文獻學發展貢獻的實際。客觀來說，清代考據學是繼承歷史上考據學成果而發展成的一個的新高峰。

如果說以毛筆、紙張爲重要標誌的寫本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考據學在兩漢的初次繁榮，那麼，雕版配以印刷所帶來的刻本時代，無疑又給考據學提供了在兩宋以後逐步繁榮的素材準備以及充足空間。同時，考據學的發展與繁榮，必然帶動各類學者對於版本的重視及版本相關問題的研究，而這又會反過來促進考據學的發展。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板本》中說“談此學（即指版本學）者，咸視爲身心性命之事”¹⁸，可以想見其對於版本學與考據學相互促進作用的感受。很顯然，多種因素的交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版本思維的不斷形成、甚至局部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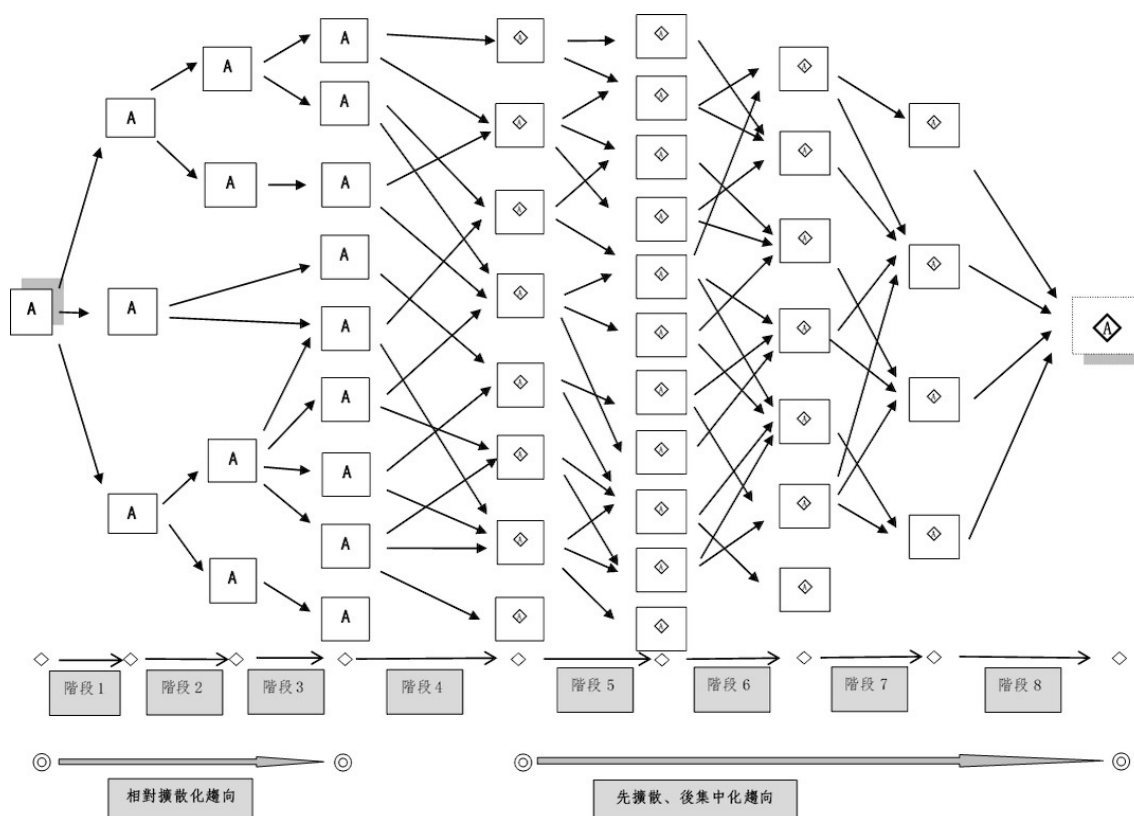
¹⁶詳參章學誠撰、葉瑛點校《文史通義校注·朱陸》，中華書局，2014年，第309頁。

¹⁷詳參張舜徽《廣校讎略》卷五，中華書局，1963年，第123-124頁。

¹⁸《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板本》篇，第8頁。

三、版本思維下寫本文獻遞變進程觀察

如果將上文有關版本和版本思維的討論動態化，以文獻流傳的一般性邏輯進程為背景，并補充以若干必要環節，將某種文獻由寫本時代發展至刻本時代的變化情況置於理論狀態下，我個人認為，大約可以形成如下所示的進程圖：



這張圖表以文獻 A 為例，假設其在一般性的理論隨機狀態下，歷經寫本時代的謄抄與傳播、雕版印刷逐漸取代手工抄寫、刻本時代的印刷數量激增，以及運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學術考據方式的不斷整理，最終遞變作刻本形態的文獻 A。整個進程可以具體分作四個層次來看：

- (1) 在階段 1 中，文獻 A 通過手工謄抄的方式生成了三個不同的版本。很顯然，這個階段的傳抄過程最為簡單，所受的外界影響因素也相對最少，因此，從文獻內容的完整程度而言，這是最接近於文獻 A 原始面貌的版本。之後，這三種版本“變身”為母本而繼續流傳，并在一定範圍和時間內經歷階段 2、階段 3 的再

次傳抄和初步參校而衍生出新的一系列寫本，從而逐漸形成各自的傳播脈絡和傳抄系統，文本內容各自分化的概率自然也相應開始加大。

- (2) 階段 4 示意的是寫本形態向刻本形態過渡的時期。雕版印刷在逐步替代人工謄抄時，一般會根據各自的現實情況，取用某一個或某幾個傳抄系統中的寫本作爲各自雕刻製版的底本，進行大量印刷。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寫本形態進入雕版形態的關鍵節點：一方面，製版所用底本的調查、比較、取捨、校勘，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文獻進入刻本時代後版本方面保留與沿襲的種類、內容方面多寡與優劣的狀況；另一方面，通過上述動作而生成的文本內容，自然會成爲進入刻本時代的“最初母本”，對後續刻本形態下各版本之間的具體文本有著直接的影響，這與階段 1 極爲類似。
- (3) 階段 5 示意的是雕版印刷取代人工謄抄後，一方面是得益於具備商業化基因的高效新技術及其所激發的新熱情，另一方面是商業行爲的相互比較、相互借鑑及學術行爲的版本調查、文字校勘共同作用下，從而使得文獻 A 產生了達到了刊印版本與數量的巔峰。正如上文所言，這樣的雙重巔峰時期，一方面，在載體形態上是以“藏本日亡”爲代價的，自然會帶來多樣和分化等一系列負面問題，另一方面，在具體文本上則難免出現“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的衍生性問題。
- (4) 階段 6、階段 7 和階段 8 示意了文獻 A 以“版本思維”的逐漸生成與實際實施爲背景，開始運用校勘、訓詁、輯佚等多種“技術手段”，對當前可見版本進行文本比對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力求生成以善本爲指歸的刻本文獻 A。相對於前面幾個階段，最後的這三個階段，一方面是寫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完成、雕版印刷佔據主要地位後，文獻版本數量增加而導致的版本系統相互交織、文本訛誤逐漸擴大等一系列問題的累積性表現，另一方面，也是版本思維受到版本實物數量增加的反向刺激，逐漸醞釀、成形、討論並且真正實施的體現。

必須要特別指出的是：其一，不同的文獻在由寫本形態過渡到刻本形態時，可能會因爲自身內容、流傳等方面的個體原因而經歷較上圖或多或少的階段，每一個階段內，也可能會因爲個體情況的不同而產生或多或少的分枝，甚至也會存在某個版本在某個階段即亡佚的情況（圖中已作示意）。其二，寫本形態向刻本形態的遞變，並不意味著寫本的馬上消失，實際上會存在二者交叉共處的階段。不過，從總體上來說，這個圖表已經基本能夠示意出大多數情況下的傳世文獻歷經寫本時代、刻本時代的遞變發展進程¹⁹。

¹⁹李零先生在《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中談到，“作爲書本的經典，它的形成，主要是漢代”，“很多古書，之所以能傳下來，產生持續的影響，不但經反覆篩選，而且被不斷改編。然而，一旦進入

站在版本與版本思維的視角，從上述充滿複雜性與交織性的演變進程中，我個人認為至少有如下三點規律性的現象值得予以特別關注：

(一) 從版本外在的傳播特點來看，寫本時代在總體上表現為相對擴散化趨向，而刻本時代則表現為先擴散、後集中的趨向。

受制於寫本時代生產力水平、文化發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寫本的謄抄速度要相對落後於刻本的刊印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導致寫本時代的版本衍生速度相對較慢，而且在總體上呈現單向擴散的趨勢。在示意圖中，階段 1 到階段 3 即是清晰的表現。這種特點，已經可以從上文中葉夢得“人不多有”的回顧中得到反映，還可以從寫本時代中意識到文本訛誤所耗費的時間上得到反向驗證。例如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勉學》中記載了兩件北魏時期的軼事²⁰：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翮’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一個是“久後尋迹，方知如此”，一個是“期年之後”方由碩儒指出其誤，這其中，除去當事人主觀意識的原因，客觀上大約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寫本時代的文獻種類在總量上相對較低，以及同一種寫本的不同謄抄版本數量相對較少。

雕版印刷作為新興產業出現後，大大緩解了人工勞累程度，官民刻書坊大量建立，促使刻本數量在短時間內呈現爆發式增長。《宋史》卷四三一記有景德二年（1002）時邢昺與宋真宗談論刻本一事²¹：

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經典化，人們對它的改編，就少得多了，不屬於經典的，大家改它，還容易一點”。這實際上是強調了“經典化”文獻具備相對穩定性特徵。我個人表示贊同，同時也認為，這類文獻在由寫本形態過渡到刻本形態時，應當首先具有普通文獻的一般性遞變特點，然後具有作為“經典化”的相對穩定性優點。《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收入《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468-487頁。

²⁰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7頁。

²¹詳見《宋史》卷四三一《邢昺傳》，第12798頁。

北宋初期僅四千，景德年時十餘萬，四十年左右的時間，“經版”增長了二十幾倍，確實是“大備”，而所謂“蓋力不能傳寫”之語，也是對上文寫本時代版本衍生速度相對較慢的真切反應。很顯然，這樣的增長方式也勢必帶來版本的急劇擴散化。這正是示意圖中階段 5 所反映的。但是，版本的驟然增長又會必然增加文本訛誤的概率，進而影響文獻內容的正確表達與順利流傳。《宋史》卷四三一記判監李至會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云云²²，故“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同卷還記咸平初，“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眞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²³，云云。此類記述，不勝枚舉。近人陳乃乾曾言“嘗謂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且分作無心致誤與通人臆改兩類，也是對這一現象的總結。

從外在表現上可以看出，在寫本時代，文獻 A 的謄抄次數與版本數量表現為同步遞增的狀態，版本系統呈現出相對擴散化的傾向；在刻本時代，雕刻製版帶來的高效率固然會增加文獻 A 的數量，但同一套雕版的印刷次數與版本數量未必表現為同步遞增的狀態，版本系統總體上會呈現出相對集中化的傾向。因而，兩宋以後版本、目錄、校勘之學蓬勃發展，一方面是刻本時代文本內容訛誤、版本系統紊亂現象急劇增加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解決各類訛誤、紊亂日趨增長問題的必然要求。以生成善本為最終指歸的版本思維體現在實際效果上，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日趨減少版本的數量和衍生枝蔓，這就是階段 6 至階段 8 所要表示的意思。

（二）從版本內在的繼承特點來看，寫本時代難以在文本傳抄系統上建立有序性的問題，在刻本時代被加倍放大。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文獻在謄抄或刊印方面的時間、動機、人工等因素可以進行有意識的控制，但是文獻的傳播方式、傳播範圍、傳播主體等一系列的繼承與流傳問題却無法進行有目的的提前設置。因此，一旦進入大範圍的傳播流通環節，最初生成的文獻即相應轉變為“母本”的角色，成為再次謄抄或刊刻的依據，再經過一個流傳的環節後，又轉變為新的“母本”，繼續下一個環節的傳播。類似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也是新版本生成、傳播、再次生成新版本的過程，自然也是版本系統生成的過程。無論是寫本形態還是刻本形態，這種傳播與衍生的規律性現象是共通的，並且在刻本替代寫本後，由於文獻製作的高效、文獻數量的增多以及傳播範圍伴隨生產力的不斷擴大，愈發加劇了版本系統衍生的複雜性。

在上文圖表中，階段 1 到階段 3 示意的正是文獻 A 在以寫本形態傳播時的一般

²²詳見《宋史》卷四三一《崔頤正傳》，第 12822 頁。

²³詳見《宋史》卷四三一《崔頤正傳》，第 12822 頁。

情況。可以看出，文獻 A 在開始傳播後，即由原始版本而轉變為“母本”，生成了新的三個謄抄本，而這三個抄本在傳播環節各自轉變為“母本”又形成各自不同的抄本系統和傳播脈絡。文獻 A 在經過階段 3 後，即在數量上由 1 個而變成 9 個，而且各個階段內的謄抄勢必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本對照與借鑑，從而形成了完全不具備預設規律的傳抄系統。階段 4 示意的是以文獻 A 的寫本為“母本”，被用來刊印為刻本 ㊦ 的過程。在這個環節中，刊刻時“母本”的選擇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隨機性，寫本形態下生成的傳播脈絡幾乎被徹底打亂，既存在利用多個寫本生成一個新刻本的情況，也存在某個寫本被完全忽略的情況：前者可視作自劉向以來的校勘章法程式的規模化實踐與商業化運作，後者則造成了文獻 A 的某種版本亡佚不傳。在完全進入刻本時代後，規模化的機械複製代替了單一化的手工謄抄，同一文獻的流傳數量急劇增加，自然也意味著下一個流傳環節的“母本”數量也隨之增加，而這則明顯帶來版本系統複雜性的增加。在階段 5 中，文獻 ㊦ 已經由 8 個版本而擴大至 11 個，以及各版本之間的相互交叉，正是示意了上述情況。應當承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雕版印刷，從而在客觀上大大降低了因流傳而導致的文獻文本訛誤機率，但同時也促進了文獻相互交流的頻繁和文獻傳播範圍的擴大，而這兩者又在主觀上增加了文本的訛誤機率。文本的訛誤機率、文獻的傳播範圍與版本系統的複雜程度，三者之間形成了同步遞增的關係。

我個人認為，在刻本通過應用體量逐漸擠壓寫本存在空間的階段，雕刻製版大概率是隨機選取了寫本的某一個版本為底本而進行的，也不排除會存在取用多個寫本相互參考、略加校勘後再刊刻的情況。從寫本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無序性選擇，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寫本原有的前後繼承與傳抄系統，但是又并未在雕版之初建立透明、有序的版本挑選系統。因此，雕版印刷完全繼承了寫本時代難以在文本傳抄系統上預先建立有序性的問題，又藉由文獻生成速度、傳播範圍等一系列因素而被加倍放大，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的前後繼承關係愈加複雜、甚至雜亂。

（三）從版本之間的異文特點來看，版本的傳播趨向與文本繼承特點產生的疊加效應，增加了文本訛誤的產生概率。

從校勘學的角度出發，文獻文本的訛誤錯亂表現，大約可以歸納為脫、誤、衍、倒四大類。至於訛誤的原因，歷代均有學者歸納，例如清人王念孫曾認為文獻“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²⁴，再如近人陳垣先生則認為謬誤之因在於“其間無心之誤半，有心之誤亦半”²⁵。這兩類觀點，在一般論述里頗具有代表

²⁴詳參王念孫《讀書雜誌·淮南內篇雜誌》之《讀淮南子雜誌書後》，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影印王氏家刻本，第 962 頁。

²⁵陳垣《校勘學釋例·序》，中華書局，2016 年，第 1 頁。

性。“傳寫訛脫”實際上大抵是出於“無心之誤”，而“馮意妄改”則自然屬於“有心之誤”。可以看出，對參與文獻歷次傳播環節的抄手、刻工等在行為動機上的客觀、主觀區分，是歸納文獻訛誤原因的切入點。

如果將上面文本訛誤的成因歸納，與文獻的版本生成、流散傳播和載體形態遞變結合起來，那麼可能容易發現兩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其一，無論寫本形態，還是刻本形態，在同一種載體形態中，同一種文獻的版本增長數量與訛誤產生概率成正比。換個角度來說，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每一次謄抄或雕版的過程，既是新的版本生成的過程，也是新的文本差異（包括訛誤）產生的過程。這個現象，在寫本時代表現的最為明顯。《抱朴子》中所謂“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²⁶，應當包含有此意，亦可應用於總結類似北宋姚祐因福建刻本“坤為金”而致誤之事²⁷。其二，在寫本形態向刻本形態的過渡階段，刻本以數量優勢擠壓寫本的存在空間，文本的訛誤產生概率更大。余嘉錫先生曾認為，“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本，固多能存古書之真，然其譌謬處，乃至不可勝乙。宋人刻書，悉據寫本，所據不同，則其本互異。校者不同，則所刻又異”，甚至“時異用殊，則以己意增省其文，竄易其語”²⁸，其言甚韙。

版本之間的四大種類訛誤，具體表現在文本上，則可以產生多種複雜交錯的現象。清代學者孫詒讓在《札迻·自敘》中，曾對古籍抄刻致誤問題有過論述²⁹：

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晏子書》之以“放”為“對”，《淮南王書》之以“士”為“武”，《劉向書》之以“能”為“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輒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屢改，逵逕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

從竹帛到梨棗，從抄寫到刊刻，導致古籍文本產生異文、甚至訛誤的原因，既有字形通假、字體混淆之因，也有俗寫流失、校刊篡改之故，但根本原因實際在於版本遞變更替之間，不斷鈔寫刊刻所導致的文本訛誤的累積性爆發。

基於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發現，古代社會的主流文獻形態由寫本逐漸遞變到刻本，從內部驅動因素來說，是源自於寫本時代固有的文獻種類數量和文獻傳播方式，

²⁶詳參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之“遐覽”篇，中華書局，1985年，第335頁。

²⁷北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一：姚祐元符初為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着福建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123頁。

²⁸詳見余嘉錫《藏園群書題記序》，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冊，中華書局，1963年，第568-569頁。

²⁹詳見孫詒讓《札迻·自序》，中華書局，1989年，第2頁。

日益滿足不了秦漢隋唐間不斷提高的經濟文化水平和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而從外部推動因素來看，也是兩漢以後紙張製造技術的日趨純熟和製造產量的大幅提高，對效率相對低下的手工謄抄方式的自我揚棄。潘吉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做過總結：雕版印刷這種機械複制的技術最初來自於民間，印刷品也主要在民間流行，優點是比寫本字大易認，而且便宜，不過，“這種新型複製技術的出現，總不能指望會迅即擴展，也不能很快淘汰手抄勞動，要有手抄與印刷、寫本與印本長期并存的過渡時期”³⁰。在我個人看來，刻本逐漸替代寫本的過程，可以看作是“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革行爲，這與寫本替代簡策是截然不同的。對於這一點，或許發明活字印刷的畢昇出身是“布衣”，亦是一個側證³¹。顯然，這種遞變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主流方向的，且已爲兩宋以後經濟、政治、文化日趨發達的事實所證明。因而，日本學者池田溫先生在論述敦煌寫本時曾說：“相對於寫本，刊本的優勢地位是決定性的。因此進入印刷時代后，寫本書籍幾乎全被廢棄了。歷史發展到 19 世紀后，在 10 世紀之前的寫本幾近全無的情況下，《說文》木部殘卷、《唐韻》之類的唐代寫本遺品自然成爲了舉世無雙的瑰寶而受到世人的重視。”³²

誠然，從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最早在北宋時期就應當已經存在寫本形態與刻本形態比肩共存的“過渡階段”。不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1）相對高效的雕版印刷代替了原來的手工抄寫，固然增加了文獻的流通傳播數量，但也使得寫本時代原就脆弱的傳抄系統，到了刻本時代更加混亂，具有梳理版本的感性需要。（2）由各種原因導致的文獻文本訛誤，與日益擴張的版本數量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致使同一種文獻的不同版本在文本內容上差異過大，具有回溯原本的理性需求。因而，寫本向刻本的遞變，促使寫本時代開始自發萌芽的版本意識，逐步積累條件，上升爲自覺的版本思維。換一個角度來說，版本思維的形成，既是符合學術上以善本爲指向的文獻整理傳統，也是符合當時社會生產與商業經營的需要。

對於上面圖表中的文獻 A 而言，伴隨 A 在傳抄、刻印歷程中所帶來的文本內容變化，在客觀上需要進行一次以善本爲指歸的校理，從而形成 \diamond ，但是顯然二者是無法劃上等號的。因此，面對根據刻本時代的 \diamond 的具體文本，試圖以逆向的方式推導或校理出寫本時代的文本 A，不僅從邏輯上大概率是行不通的，即使推定出文本，其面貌也基本不可能是 A 的原始狀態。換言之，刻本的日趨發展壯大，是以寫本的

³⁰詳參《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02頁。

³¹據《夢溪筆談》卷十八，“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云云，“布衣”自當是平民百姓之義。我個人以爲，能夠看到雕版印刷在刻板上的缺點，從而以“活版”的方法來改良，則畢昇必當是熟悉雕版環節的人。潘吉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爲“很可能是雕版工人”，我個人表示贊同，詳參第七章《印刷術的起源》第四節《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第306頁。

³²詳參池田溫《敦煌漢文寫本的價值——以寫本的眞僞問題爲中心》，見《敦煌文書的世界》“本編”部分，張銘心、郝軼君譯，中華書局，2007年，第189頁。

不斷萎縮為必然代價的。這對於寫本傳抄系統的分化、甚至割裂問題，衝擊得最為明顯。同時，這個負面影響又因為寫本數量的減少而被逐漸掩蓋，甚至被忽略。無疑，以敦煌寫本為代表的寫本類文獻的不斷發現，寫本文獻傳抄系統的相關問題就有了客觀思考與謹慎處理的必要性和現實性。

餘論

需要特別做出說明的是，雖然本文是在討論寫本時代與刻本時代的文獻比較所引發的一些小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認為寫本與刻本是完全對立的。事實上，寫本與刻本都具有其自身的長處與短處，則勢必會在不同的應用場景、社會階層中靈活發揮各自的記載功能。況且，即使是在雕版印刷術大行其道後，以手工抄成的寫本類文獻仍然存在，包括“抄本”（亦作“鈔本”）、“影抄本”等，也有學者直接稱作“寫本”，如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內府抄本《洪範政鑒》十二卷。《書林清話》就以欣賞的眼光，記載了“明以來之鈔本”近百種³³。因此，“寫本時代”與“刻本時代”的稱呼，在我個人看來，只是根據不同時代下文獻載體的比重不同而進行的概括性描述，顯然二者無法、更不可能是截然對立的。

另外，在本文開篇的案例中，將《金光明經》感應記和《黃仕強傳》兩種寫本文獻劃分出傳抄系統來分別整理，是基於我個人對於寫本傳抄特點有別於版本思維特徵的理解而做出的嘗試，自然不可能是唯一的整理思路，因而權作引玉之磚，連同本文一起，祈請方家斧正。

（作者為浙江大學副教授）

³³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一書中特設《抄本稿本批校本》一章，專門討論了宋代以來古籍的活字本、抄本、批校本等具備人工謄抄特點的文獻，並稱之為“刻本的派生物”，詳可參看。《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3-214頁。